

历史形态学的启示

——李福清院士的文学研究方法*

刘亚丁

提 要 | 本文在综述中俄有关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中国文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在资料方面他重视多语种资料的搜集运用,通过商榷补充等切实推动学术向前发展;他将形态学与历史诗学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形态学,这成就了他的学术融通,决定了他的学术道路。

关键词 | 李福清 多语种资料 历史形态学

中图分类号 | I512

作者信息 | 男,1959年生,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及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创新基地、四川大学当代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610064。

2012年10月3日,在得知著名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先生驾鹤西去后,我不禁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李福清院士,俄大汉学家,治中国文学年画既广且深,几无出其右者。其八十寿诞将至,天大冯骥才艺术院为之暖寿筹会。会期已近,不料噩耗传来。予受益于李院士良多,吟成五古八韵,不计工拙,聊表哀思。俄人呼癌症为螃蟹。

秋风吹肃气,萧瑟扫疏林。
李翁八十寿,津城迓伊临。
著文颂学问,莫城传噩音。
螃蟹亦何恶,先摄寿翁心。
邮件历历在,语疏意弥真。
松云暮恻染,薜露朝悲吟。
阴阳隔河汉,泪下沾衣襟。
逍遥游龙府,天宫论艺深。

对一位学者的最好的缅怀,是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思考他的学术贡献。在我国和俄罗斯,原来就有讨论李福清先生的学术成就的文章若干,如钟敬文先生为李福清先生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写的序,称赞他“知识的博洽”、“科学的敏感”、他的“分析能力”,以及“严肃与公允相结合的态度”,同时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李福清商榷。^①马昌仪先生分阶段、历时性地点评李福清先生的学术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罗斯《中国精神文化大典》中文翻译工程”(12&ZD170)、教育部重点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在东北亚的传播研究”(10JJDZONGHE011)、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近二十年俄罗斯的中国观研究”(SKG101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李福清神话故事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第iii~xv页。

成就,认为李福清重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重视系统研究,注重从诗学、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并指出他重视资料工作。^①李明滨先生在为《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所作的序中概括了李福清学术成就的四个方面:他的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中国俗文学和民间文学是他研究的重点领域;他研究台湾原住民文化,并同大陆各民族文化比较;他研究中国的民间艺术。^②2002年H.尼古林发表《汉学家、民间文学研究家、文艺学家》一文,纪念李福清先生七十诞辰。他回顾了李福清先生的学术道路,历时性地概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著作。^③五年后,E.谢列勃利亚科夫在《科学院通讯院士鲍·利·李福清(为七十五诞辰而作)》一文中同样介绍了李福清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他强调“学术界高度评价他对那些中国都不曾予以应有关注的中国文化典籍和问题的大胆的探索。解释中国人精神生活特征的不懈的热望使他总是既对当代作家的艺术作品兴趣盎然,又对数千年的书面文学和口头创作孜孜以求。”^④这两篇文章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李福清先生对蒙古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以及他对西伯利亚、远东民间文学的研究,他这方面的著述中国同行是不太了解的。这些文章都采用按照时间顺序点评李福清院士的主要学术著作的结构方式,也或多或少涉及他的文学研究方法,但是对这些方法点到为止。现在不妨在共时的、更宏观的层面上来思考李福清先生的文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尤其应该思考,李福清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方法对我们自身的研究有什么启发。

一、注重多语种学术资料

李福清先生每做一个题目总要竭尽全力在中国搜集各种资料,这是前述的文章多加赞美的他的优长之处。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他对世界各语种资源的重视和搜集。他总是以中国的文学为核心问题,以世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作为自己考察的对象,更

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他曾说“我还要指出一点,就是我研究一个问题时尽量穷尽俄罗斯的、中国的和西方的资料,既要注意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有时有关学者发现了新材料,你要注意吸取,又要注意搜集学者新发表的研究著作。真正的理论著作是不能根据局部的材料来写的,如同植物学著作,不可以只用一个地区的植物来谈世界植物的分类及其理论问题。普罗普教授的《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梅列金斯基教授的《神奇故事人物研究》和《神话诗学》等都用了全世界的民间故事材料。”^⑤在《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二卷《神话·宗教卷》关于中国神话的序言(长达77页)中,李福清先生旁征博引,对中、俄、日、欧洲和美国有关中国神话研究的著作一一点评,多有洞见。李福清先生首先介绍俄罗斯汉学家C.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发表于1892年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念与神话》,接着分析了日本学者井上圆了发表于1882年的《论儒家的崇拜对象尧舜》和另一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相关研究。李福清先生接着批评1922年出版的英国汉学家倭讷(E. T. C. Werner)的《中国神话与传说》,认为其来源甚狭,分类不确。继而较详细地介绍鲁迅、沈雁冰、胡适和顾颉刚等中国学者的神话研究。这样就使我们能够回到中国神话研究的“现

^① 《李福清神话故事论集》,1984年,第xvii~xxxviii页。

^② 李福清《古典小说与传说》,李明滨选编,中华书局2003年,序,第1~7页。

^③ Никулин Н. Юбилей ученого. Синолог, фольклорист,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 К 70 - летию Б. Л. Рифтина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 №2. С. 191.

^④ Серебряков Е. А. Член-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РАН 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 (К 75 - 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 Известия РАН. Се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2007. №. 6. Т. 66. С. 61.

^⑤ 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文学”——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上),《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场”。对于1924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对《尚书》中的神话传说的研究,李福清先生则不吝赞词。他谈及德国汉学家何可思(Eduard Erkes)对后羿神话的研究,称赞了其对该神话与太平洋周边的相似神话的比较研究。李福清先生还叙及德国学者艾伯华的有关研究、瑞典学者高本汉1946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神话和崇拜》。他注意到高本汉对这些神话文本展开的历史语文学研究、高本汉同闻一多的“对话”,以及50年代的神话研究,如贝塚茂树的《众神的产生》、芬斯特布施(Finsterbusch)的《山海经与造型艺术》。对卜德(D. Bodde)的《世界神话》、袁珂的《中国神话》、王孝廉的《中国神话传说》等,李福清先生皆有介绍点评。^①这样详尽的学术综述,直接把《神话·宗教卷》中的神话研究部分推到世界中国神话研究的学术前沿。

商榷纠谬,推进学术,是李福清先生广泛征引资料的目的。在《三国演义与民间传说》中,为了考察平话体裁的源流,李福清先生几乎是考镜源流,分别引用中国学者张政烺、鲁迅的观点,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王起等的《中国文学史》,以及美国学者约翰·克兰普赞、捷克学者雅·普实克的观点或材料,与之商榷或驳难,得出了平话与世界流传的“民间读物”相类似的结论。^②虽然其结论未必会得到广泛赞同,但广泛搜求各语种的文献资料,以求甚解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在《从比较神话的角度再论伏羲等几个神话人物》一文中,李福清先生以闻一多的《伏羲考》作为讨论的起点,以比较神话学为理论支撑,广泛征引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蒙古的神话传说,使人们对伏羲等神话人物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③对于学者的错讹,李福清先生总是能直接指出。比如为英文版《回族神话和民间故事》写的书评中,李福清指出:收入故事中的《阿丹和好娃》的故事不是回族神话,而是《古兰经》传说。^④

如果我们放眼俄罗斯汉学界,会发现注

重多语种资料的搜集和运用并不是李福清先生一人的创举。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中国史在中国和欧洲》,将他自己对中国史学的历史沿革和流变的准确描述置于当时中国和欧洲学术界对中国史的研究背景之中,点评了梁启超的《中国史学研究法》,英国学者倭讷,法国学者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看法。^⑤孟列夫对《双恩记变文》的研究也是如此,他首先述评了中国学术界各种关于“变文”的定义和解释,如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的《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他还转述了郑振铎、刘大杰和谭丕模对变文的研究。孟列夫还关注到了日本学者川口久雄、金光照光的变文观。^⑥他分别与之对话、商榷。

关注多语种学术资源可达到若干目的:第一,在广泛的背景下,才能看清楚什么是前沿问题,什么地方是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找到有开掘价值的方向或课题。第二,在梳理已有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材料,

^① 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ифология. Религия.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2007. С. 16 – 77.

^② (俄)李福清《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尹锡康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7~50页。

^③ 《古典小说与传说》,中华书局,2003年,第168~208页。

^④ Boris Riftin and Boris Parnickel, *Mythology and Folklore of the Hui: A Muslim Chinese People* by Li Shujiang; Karl W. Luckert, *Asian Folklore Studies*, Vol. 57, No. 1998, p. 371.

^⑤ 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 Китае и в Европе //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нига 1. С. 461 – 488.

^⑥ Бяньвэнь о воздаянии за милости, часть 1, Факсимиле рукопис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Л. Меньшикова. М.: Наука, 1972. С. 25 – 36.

或研究思路的启发。第三,与多语种的学术同行对话或商榷,切实推进学术发展。第四,要做一个题目,则应以世界上主要国家或地区为考察对象,对材料做竭泽而渔式的全面搜罗,做完后才大致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了“阶段性的成果”了。以此观之,制约我国学术的瓶颈甚多,学者知晓的外国语言数量有限恐怕难辞其咎,学风不够扎实似乎也不无干系。

二、运用历史形态学

在研究中国文学的过程中,李福清先生整合形态学和历史诗学,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历史形态学。

形态学(Типология)源出于希腊语 Τυπος,“是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它的基础是借助概括的和优化的模型或类型来区分客体的系统和它们的亚类。形态学被运用于比较研究,其对象是在时间中并存的,或在时间分化的客体组织的重要特征、联系、功能、关系、层次”。^①在俄苏,形态学是化学、生物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赫拉普琴科等学者将其运用于文学研究。赫拉普琴科在其《文学的形态学研究》一文中写道:文学的形态学研究“揭示文学现象和因素,可以将这些原则和因素称为众所周知的文学—美学共性,归纳为某种同样的类型和种类”。^②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为责任单位出版的,李福清等编委集体编撰的《东方和西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学与联系》,就是以对文学的形态学为研究方法的:“一系列文章本身就是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学现象的形态学共性和文学发展道路的研究。”^③在这本书里,李福清先生发表了作为代序言的、长达108页的《中世纪文学的形态学和相互联系》。在强调形态学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李福清先生清楚地意识到了形态学的比较方法被滥用,被泛化为无边无际的万能工具的可能性。“‘形态学’的概念在文学的范围内有时会在各种各样的意义上使

用,有时是不同的文学发展道路的定义,有时与此相反,则是对语文艺术发展中产生的相同的现象的追踪。”^④他特别担心的就是通过将东方的文学现象与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西方文学牵强比附的方法。因此他给自己的形态学研究规定了具体的范围:“我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至多在三个层面(水平)上展开:a.意识形态层面;b.描写层面;c.叙述层面(情节组织、讲述的特殊手法)。”^⑤我们看到,三个层面的形态学研究,就成了李福清先生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

正如马昌仪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李福清“把苏联历史诗学传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研究”。^⑥历史诗学是文艺学的分支,它研究文学体裁、文学作品和文学风格的发生学,在历时性中研究文学。历史诗学的奠基人是19世纪的俄罗斯学者维谢洛夫斯基,在20世纪他曾被当做“世界主义者”受到批判,直到70年代历史诗学重新得到关注。普罗普和梅列金斯基等都被视为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的继承者。形态学本身就不拒绝时间意识,但在李福清先生的形态学的研究中,直接引入了历史的维度,时间的重要性被他高度强调。李福清先生自己也谈道:“19世纪俄国著名学者维谢洛夫斯基院士很早就开始研究‘历史诗学’问题。历史诗学的任务是

① Огурцов А. П., Юдин Э. Г. Типология.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БСЭ, 1976. Т. 25. С. 563 - 564.

② Храпченко М. Б.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зуч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 Позна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М.: Наука, С. 180 - 181.

③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М: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4. С. 3.

④ Т. ж., С. 48.

⑤ Т. ж., С. 48 - 49; 参见《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中文版自序,第5页。

⑥ 《李福清神话故事论集》,第 xxxii 页。

研究各种文学的种类、体裁、描写方法等的历史发展,‘文学’这个概念的演变,诗学的各种历史类型及其与时代的关系。例如,古代文学是一种类型,有自己的特征;中世纪文学是另一种类型,也有自己的特征;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又有自己不同的类型特征。”^①可见,李福清先生自觉地将历史诗学和形态学相结合,开展了历史形态学研究。

他运用历史形态学方法,把研究的范围基本上限定在中世纪,^②即在中世纪范围内对中国文学展开纵的、横的研究。李福清或考察某个题材,如孟姜女、三国这样大的题材,在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纵的演化;或进行横向研究,将台湾原住民的巨人故事,与世界不同民族的相似故事进行比较;或考察关公、伏羲这类原型在远东的传播。

历史形态学决定了研究的内容是受时代和层次限制的。李福清先生拒绝将中世纪的现象同新时代(即18世纪以后)的现象进行形态学的对比。如他明确提出“用比较法一定要注意历史发展阶段,如有中国学者把《三国演义》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作比较,那完全无关。前者是典型的中世纪作品,后者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作品。”^③再看层次限制,他明确指出:同样作为中世纪的作品,中国14世纪的书面史诗《三国演义》、《水浒传》可以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奥里斯托的《疯狂的罗兰》和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进行比较。但只能在这样一点上进行比较,即中国和意大利的作者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材料,并加以提炼。假如着眼于作者的思想表达层面,奥里斯托所表达的讽喻,则是罗贯中或施耐庵的世界观中完全找不到的东西。^④即是说在思想层面它们是不能比较的。

运用历史形态学可以发现过去被遮蔽的东西。通过历史形态学提供的纵横比较方法,李福清先生实际上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人们或许忽视的问题:中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从古至今的“全世界纪实”。李福清

指出:在拜占庭—斯拉夫文化中,历史作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包含了从“创世纪”直到与作者接近的时期的“全世界纪实”,一种是王朝和战争的历史。他指出,在中国,第二种历史,即王朝的历史很发达,但没有第一种历史。在中国这样典型的儒教国家里,因为儒生们将其他民族(包括其他接受儒家思想的远东各民族)视为不知正道的“夷狄”,所以中国没有“全世界纪实”。^⑤

李福清先生提供了历史形态学研究的许多范例。在《三国演义与民间传统》中,李福清实际上是以三国的题材为核心,展开对这个题材的历史形态学的考察,换言之,即是对三国题材的流变史作了形态学考察。H. 尼古林指出:“在其关于《三国演义》的专著中,李福清在学术界首次(利用罗贯中的小说的材料)研究了中世纪东方各种文学方法的主要问题,研究了在这些文学中艺术时间的反映。他非常详尽地研究了中世纪中国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联系,这对中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李福清在学术界首次描述了这类三国评话的结构,同时分析了书面的文本是如何变形为口头的、由说书人讲述的文本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得到了对出场人物外貌的分析,对主人公情感、思想、

① 刘亚丁,2007年。

② 《东方和西方中世纪文学的类型学与联系》编委序言中指出:中世纪指的是公元初到17世纪末,是由于世界基本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形成过程出现的公元初到17世纪(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С. 3.)。李福清在《神话与鬼话》中对中国中世纪作了具体的表述:中国的中世纪开始于三国时期,持续到19世纪末至民初〔俄〕李福清《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20页)。

③ 刘亚丁,2007年。

④ Типология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и Запада. С. 52.

⑤ Т. ж., С. 16 - 17.

行动的分析,对言语的分析的补充。”^①从尼古林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福清的历史形态学方法得到了俄罗斯同行的关注和认可。

在李福清先生的历史形态学研究中,历史诗学和形态学是互相融合的,如果偶尔出现分离的状况,就会产生疏漏。比如李福清先生对形态学的框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涉及了意识形态、描写和叙事层,但是他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有关三国平话的部分,形态学就同历史诗学分离了。李福清在以形态学来考察《三国演义》之前的三国题材时,有“《三国志平话》的叙事”一节,他所展开的“艺术时间”、“说话的影响”、“情节结构和行为型式”和“叙事中的前提文件的穿插”等内容符合形态学的分层要求,但并没有从历史诗学的角度说清楚《三国志平话》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实际上未展开历时性的叙事研究。这或许是因为李福清的叙事在运用形态学时过于强调“层次性”,而略为忽视了“历时性”这一维度。

从总体上说,李福清先生的历史形态学研究方法,具有横向观照东方西方、纵向注重时间的融通性。在他的历史形态学的观念中,时间是中世纪,关系是远东与西方。由于类型学的内在规定性,他破除了中国传统文

学研究中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阻隔,也打破了中国文学与周边民族的阻隔,更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以朝代为基本单位造成的时间阻隔。由于李福清先生的历史形态学能够突破这些阻隔,所以收到了豁然贯通的功效。

李福清先生在选择科研道路的时候,没有走向文本的纵深开掘的道路,如后期写作《赞成与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札记》时的B. 什克洛夫斯基,如写作《论俄罗斯诗歌:分析、阐释和概述》时的M. 加斯帕洛夫;也没有走由对众多本文分析、阐释进而上升到理论层面,提出某些体系性洞见的道路,如他的老师普罗普、同事梅列金斯基。他选择了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或不同体裁的演变,它们的亚类的发展,它们在不同历史时代中的集中(各种三国题材集中为《三国演义》,孟姜女故事的集中)、分化(《三国演义》向民间评书的分化)。这些都是由他所钟情的历史形态学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应该说,李福清先生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学术道路,为此他必须要终年奔走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为他用历史形态学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同时也为研究中国年画)寻找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责任编辑:高媛)

※

※

※

^① Никулин Н. Юбилей ученого. Синолог, фольклорист,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 К 70 - летию Б. Л. Рифтина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2. №2. С. 181.